

NEW AMERICAN 新美国历史

[美] 埃里克·方纳 等著
ERIC FONER

齐文颖 林江 等译

History
History
History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 美 国 历 史

埃里克·方纳等著
齐文颖 林江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美国历史/ (美) 方纳 (Foner, E.) 等著; 齐文颖等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9

ISBN 7-303-04772-7

I. 新… II. ①方… ②齐… III. 美国-历史
IV. K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5622 号

京权图字: 01-98-1748 号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PHILADELPHIA 19122

COPYRIGHT ©1990 BY TEMPLE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由美国新闻署协助提供中文版权

中文版权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谢维和

北京东晓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8.5 字数: 205千字

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2.00元

导 言

在过去的 20 年中，美国的历史进行了改写。20 世纪 60 和 70 年代的社会运动，粉碎了主宰历史写作的“意见一致”论。美国的历史学家，先是受到这些社会运动的鼓舞，而后又受到借用其他学科新方法的影响，于是对历史研究的实质重新进行了界定。“新历史”的兴起，对美国普通百姓经验的强调、计量方法与文化分析的影响、旧政治史与旧文化史的失势——这些趋势今天已广为人知（还有那些争论的主题），无需在这里重申。今天对美国历史的研究，看起来远不同于上一代人的研究。

本文集是由 13 位学者的论文组成——其中有很多人一直是站在历史研究转变的最前沿——每篇都是根据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或某一重大主题的理解来评估新近的发展。编写这本文集的设想最早是由美国历史学会提出的，要求编写一个系列手册，为专门对美国中学的历史教师讲演用，旨在使他们了解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开头提出的计划，内容不实，后经修改终被采纳，并由坦普尔大学出版社以选集的形式出版；现在又由美国历史学会以《新美国历史》的书名单独出版，这样，受众面拓宽了：学生、教师，以及关心当前美国历史研究状况的广大公众。

本书无意事先为作者制定出某种模式，也不强求作者按某种观点去写，或照规定好的框架去进行解释，而是放手让每位作者根据他或她的思考尽量发挥。尽管如此，某些主题在不同的文章中不仅是一再出现，且带有明显的规律性；这证明“新历史”已对我们过去了解的美国历史进行了改造，而且影响很大。

如果说近年来美国历史研究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对那些过去备受忽视的群体经验的注意——不是简单地像对一个早已存在的团

体增添一些关于它的知识，而是要从根本上重新界定历史本身。妇女史的范围已大大拓宽了，它已越出了早期妇女史学家所从事的争取妇女选举权运动的范围，而进入到那些过去被忽略的领域，譬如，性别史。劳工史也从过去只对工厂工资劳动者的历史和工会工人活动的历史研究，扩大为围绕奴隶、家庭妇女，以及未参加任何工会组织的广大劳工群众等的研究。

更为引人注目的，可能是非裔美国人历史和妇女历史在历史学科领域内的成熟程度：虽然它们还没有被广泛地承认为一个有着它们自己的模式与争论问题的正式的分支学科，但是却被看作为了解美国广泛历史经验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些论点在托马斯·霍尔特和琳达·戈登对这两个领域所作的考察中，都作了有力的论述，在其他方面也有明显的贡献。理查德·麦考密克的文章明确指出，在计算美国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得失时，必须考虑到黑人在这些年代所遭受的严重苦难。威廉·查菲在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的变化时，把民权运动置于中心位置。在我本人论内战时期的论文中论证的是：不仅要把奴隶制和黑人解放作为危机时期的中心问题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把黑人看作是塑造这一时代历史的积极代表。

妇女史也是如此。它迫使历史学家们不仅要过去所忽略掉的那一半人口的研究填补起来，而且还要对其某些基本前提重新进行思考。琳达·克尔伯简述了美国革命如何影响“男人”和“妇女”的普遍定义，以及由于革命危机父权制本身又是如何重建起来。利昂·芬克强调了一个明显的但又长期被忽视的事实：妇女永远是国家劳工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肖恩·威尔茨阐明，杰克逊时代经济变革的一个主要结果是男女分工的思想：公众场合属男人活动的领域，私下场合属妇女活动的领域。

许多文章还阐明了新方法对近年来历史研究的影响。约翰·默林的文章表明，人口统计学是如何对“新世界”移民的死伤人口作出新的估计的，以及流行性传染病是如何影响我们对西半球原始居民死亡情况的了解的。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概述了统计分析的“新实证

主义”如何推动了社会史的发展。理查德·麦考密克和艾伦·布林克利评估了现代化理论对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和之后时期的影响。

尽管在本文集中社会史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并不存在近年来人们的抱怨，认为历史学家再也不关心政治、经济、宪法和文化等方面的历史。传统上关注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每篇论文中都包括进去了，虽然在形式上往往可能得不到先前历史学家们的认可。旧的“总统划线综合论”——主要通过总统的选举及其政府来了解美国社会的进展——已经死亡了（并不使人哀叹）。而“政治”一词的意思，在今天更多地是指政党领袖的活动。有些文章将注意力放在某一时代广阔的政治文化或“公共生活”的研究上；另外一些文章则侧重于国家本身在美国历史中的作用和不同集团为达到各自目的所使用的方法研究上。

举例来说，艾伦·布林克利在讨论“新政”时，并没有超过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和这一时期对美国发展的总体影响强加给政府的种种约束。沃尔特·拉弗伯尔的文章说明了宪法是如何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发展的。

许多历史学家最近对当代学者未能提出研究美国历史的现代“综合论”颇为哀叹。老的综合论对历史的解释，从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的“边疆论”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的“意见一致论”，已被粉碎了，但至今尚未出现一种新理论能填补这项空白。诚然，“新历史”的多样化及其建立起来的美国形象，似乎已把历史研究搞得支离破碎，妨碍了建立一个连贯的研究美国历史的新理论的努力。有几篇文章对此也颇为关注，但是在阐述和解释时都同样指出，历史研究中的支离破碎情况可能被夸大了。如果说，本文集中的论文没有能（就其性质也不能）提出一个广泛要求的新综合论，那么有几篇倒确实指出了那个方向。譬如说，肖恩·威尔茨建议，以市场革命作为中心，把美国杰克逊时代的社会史、政治史和经济史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麦考密克指出，“公共生活”是一个灵活的具有想像力的概念，可以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发展都包容进去。

正如本文集所表明的，美国历史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多元化和充满活力的领域。本文集的作者们将不断对美国历史上最迫切的问题和持久不变的主题进行研究：对自由与平等的界定，社会变革的原因，政治权力的运用等。今天，普及国家历史的知识（或者说这方面的无知），再次成了公众热烈讨论的问题。确实，我们大家——学生、教师和其他方面的公民——对我国历史了解得愈多愈好。但是，正如这些论文所表明的，最好的美国历史仍然不仅仅是事实的汇集，也不是政治上得到认可的、不容争辩的“事实”的罗列，而是对我国社会本质的一种不断前进的集体自我发现模式。

埃里克·方纳
于哥伦比亚大学

译者的话

本书是一部关于美国历史的论文集，由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主编。它由 13 位美国学者的论文组成。

每篇论述一个主题，如妇女史、劳工史、社会史、外交史、美国的公众生活，种族和移民等。

作者都是专门研究此一问题的知名专家、学者。其内容和学术水平是可想而知的。论文都是根据历史学家对美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或某一重大主题的理解来评估新近的发展，从而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历史的研究水平。

本书之所以称为《新美国历史》，在于它对人们过去了解的美国历史进行了改造，在视野和内容上有了很大变化，从根本上重新界定历史本身。

埃里克·方纳教授在本书导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论述，并对一些论文的内容和特点作了介绍和评述，有助于读者对本书的了解，并可从中看到美国历史研究的变化和发展趋势。

本书是由美国历史学会提出撰写的，是为对美国的中学教师讲演用的，目的是让他们了解美国历史研究的新成果。1990 年美国坦普尔大学曾以选集形式出版，现在又由美国历史学会以《新美国历史》书名出版。

该书可供研究、讲授及对美国历史有兴趣和想要了解美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广大读者阅读。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齐文颖、林江、严立等。

目 录

导言

译者的话

非裔美国人的历史	托马斯·C·霍尔特 (1)
1945 年后的美国	威廉·查菲 (23)
美国劳工史	利昂·芬克 (39)
大灾难的受益者	约翰·默林 (55)
种族和移民	詹姆斯·P·申顿 (79)
自由与权力：1750 - 1945 年美国外交史	沃尔特·拉弗伯尔 (97)
繁荣、萧条与战争：1920 - 1945	艾伦·布林克利 (119)
工业化时期美国的公众生活	理查德·L·麦考密克 (138)
革命一代：美利坚合众国初期的思想、政治和文化	琳达·K·克伯尔 (163)
奴隶制、内战和重建	埃里克·方纳 (186)
社会史	艾丽斯·凯斯勒—哈里斯 (204)
社会、政治、和社会革命 1815 - 1848 年	肖恩·威尔茨 (223)
美国的妇女	琳达·戈登 (242)

非裔美国人史

托马斯·C·霍尔特

由非裔美国人知识分子和活动家来研究非裔美国人史，是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威廉·韦尔斯·布朗的《黑人：祖先，杰出人物和成就》（1863年）威廉·C·内尔的《美国革命中的黑人爱国者》（1855年）以及乔治·华盛顿·威廉斯的《美国黑人史》（1882年），都记载了战争与和平年代黑人的经历以及黑人对美国的贡献。W·E·B·杜波依斯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非洲奴隶贸易的取缔》（1896年）虽出版于上世纪末，但至今仍是研究奴隶问题的重要著作。20世纪初，撰写美国黑人史的非—美历史学家还有卡物·G·伍德森、查尔斯·韦斯利、威廉·利奥、汉斯贝里、A·A·泰勒、杜波依斯等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美国白人对黑人历史的了解，可能得自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一部社会学著作。1944年，冈纳·米尔达《美国的困境》一书出版。该书不仅详尽叙述了美国黑人当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景，还用大量篇幅讲述了美国黑人的历史。它立即成为一部学术著作和一部抗议书，一次对黑人悲惨处境的客观调查，并激情地号召全国起来斗争。这本书被公认为本世纪论述美国民族关系和美国黑人生活的重要著作。

然而，米尔达的报告也招致了批评。其中包括拉尔夫·埃利森，此人不久成为一位获奖小说家。几年之后，埃利森发表了一篇评论，对米尔达的许多调查结果十分赞赏，但对报告的主题及语调持相反态度。米尔达想用突出对黑人的残酷压迫来动员全国进行斗争，却在无意中为黑人生活绘制了一幅透视图。他认为，米尔达除了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压迫及“卑鄙伎俩”作了详细论述外，剩下的就是“社会学上

的黑人”或“人类的干瘪形象”这是埃利森在其他文章中谈及该问题时的说法。他指出，黑人的生活内容肯定远不止受白人压迫这一点。他问道：“如果一个民族单单靠反抗，能生存并发展 300 年以上吗？难道美国黑人简单地只是靠白人创造出来的吗？还是说，他们至少是在他们所发现的周围的环境的帮助下创造了他们自己？”

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非裔美国人史研究，埃利森对历史研究的不同意见产生的影响无处不在，令所有人感到惊讶。这位文学家提出的疑问切中要害，特别是切中了 60 年代动乱中崛起的那一代白人和黑人学者的要害。由于过去的学术研究发生了尖锐冲突，结果，七八十年代的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用黑人自己的经历来研究黑人的历史。黑人的历史不再仅仅是民族关系的历史，也不再仅仅是黑人对国家生活与进步所做的贡献的历史。它应当是黑人的社会史、教会史、学校史、企业史、家庭史以及民间文化史。在这种历史中，黑人不再被贬低为哑巴，白人对头的牺牲品，或是受白人恩赐的受惠者。他们应是历史舞台上最好的演员，他们创立制度，维护公共价值，并把斗争与创造的遗产传给后代。

结果，黑人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从历史中显露出来了，但在这里无法对其全部内容作出考察。然而，在美国黑人史上有三个主要的分水岭：强行从非洲运到美国，接着是近一个半世纪的奴隶生活；解放，接着是半个多世纪的谷物分成制生活和佃农生活；最后是 20 世纪向北方大迁移所产生的当代黑人城市社区和第二次解放。尽管以非裔美国人史为主题的大部头著作数目增长很快，内容也十分复杂，然而，黑人历史的来龙去脉基本上都包括在上述三个时期之内了；同时，它们也是对美国总体历史进行全面研究的关键。黑人的经验已不再是美国历史中的边缘学科，它现已登堂入室，占据了全民族历史的中心位置。

奴 隶 制

把奴隶制作为形成美国历史第一个世纪的决定性的重要事件，是有争论的。当然，人们也可以将宪法、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边疆的扩张、外来移民等，作为同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然而，不论哪种事件都不能离开这一事实：即当时的美国是由一半奴隶和一半自由人组成的。因此，许多美国历史著述都致力于研究奴隶制度、奴隶制的起源以及它在民族流血战争中解体的原因。

由于奴隶制度在美国黑人历史中占有显著的中心地位，美国黑人史研究者所关注的有关奴隶制盛衰的诸多问题，与美国通史研究者关注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奴隶种植园的劳动制度；奴隶制作为资本投资的效益；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关系的本质；奴隶居住区的物质与社会生活条件；奴隶反抗的性质与发生的频率等。然而，美国黑人史关注的焦点又往往与之大不相同。例如，在一部美国通史的概论中，为了阐明内战的原因，它可能要弄清奴隶主的个性和动机。而美国黑人史则更关心奴隶制对奴隶的作用，或更宽泛地说，是把奴隶制作为对美国黑人的生活与文化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历来考察的。这两条线是密不可分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只讲述奴隶主而将奴隶置之不顾，决不是一部合格的历史著作，反之亦然。尽管如此，正如一位奴隶制历史编纂学者在概述这一问题时所指出的，重要的是要掌握这些变化的不同倾向，因为在过去 25 年里，着重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近代美国研究奴隶制的学术著作，始于 U·B·菲利普斯的《美国黑人奴隶制》（1918 年）一书。该书是在对大量种植园记录簿进行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因而在很长时间里，被视作奴隶制问题最具权威性的著作。然而，菲利普斯的解释反映了他本人的南方种族主义者的观点，这也包括在他的大量研究著作中。他把奴隶制看作是一种宽容、温和的制度。奴隶主是仁慈的，他们对奴隶生活上的关怀远远超出了对奴隶的压榨。奴隶们的劳动并不太累，也不用为衣食操心，

闲暇时还可按自己的方式进行娱乐。只有轻微的反抗，起义也很少发生。一旦发生这类事件，反抗表现出的只是幼稚民族特有的怠工和开小差，起义却具有犯罪倾向，说明没有好好管教。菲利普斯的著作写于欧洲殖民主义者向非洲扩张的高峰，他把奴隶制视为一种将黑人从非洲野蛮社会中拯救出来的措施。奴隶制度是一种“学校”，是使奴隶在此上文明生活的预备班。

尽管许多黑人历史学家不同意上述解释，但直到1955年肯尼斯·斯坦普的《奴隶制度》一书问世，菲利普斯的观点才得到系统的、全面的批判。斯坦普通过更加细致入微、全面透彻的研究，逐个地推翻了他的前辈的论据。他宣称，无论从哪方面说，奴隶制首先是一种劳工制度。它是“一种系统地控制与剥削劳工的方法”。奴隶主是工于计算不惜置人于死地的资本家，而且他们常常这么干。他们向奴隶提供的衣服、食物、住房以及医护条件，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都是不够格的。奴隶们在鞭子的驱赶下不分昼夜地干活，在累死累活地劳动一天之后，几乎没有剩下什么闲暇活动的时间。他们的家庭、宗教和社区生活实际上被大权在握的奴隶主破坏殆尽。奴隶主追求的只是“使他们提心吊胆”。奴隶种植园也不是一座学校，而是一个监狱式的劳工工厂。由于条件恶劣和前途无望，奴隶们确实进行过反抗。这种反抗是经常的，也是有效的。他们毁坏工具、开小差、撂挑子、逃跑，而且还揭竿而起，用暴力反抗他们的主人，这种事并不鲜见。

在历史专业里，很少有人对已有的主要研究成果作如此彻底而又成功的修正。然而，斯坦普的成功还不应仅仅看作是他的学术成就，还应看到当时的主流思想意识给他的启示：欧洲很快失去了对其非洲殖民帝国的控制；种族主义者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已经崩溃；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在联邦法庭和南方的大街上受到攻击。菲利普斯的研究依据的种族主义假设被斯坦普的“种族盲”主义取代。斯坦普开始就宣称，他作为学者的个人信念为：“我一直把奴隶看作是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的人，黑人只不过是长着黑皮肤的白人，他们没有多出什么，也没有少了什么。”

斯坦普的假设表达了一种令人钦佩的情感，回应了当代黑人争取承认与“白人一样”（特别是在基本民权和公正待遇）的斗争。他宣称，他的目的是要了解“奴隶制对黑人的意义是什么？经过他近来苦苦探索又是如何回答这一问题的”。因此，斯坦普把奴隶制研究的焦点，从对局部冲突的研究转向奴隶制对非裔美国人历史的意义，以及它给美国黑人带来的遗产。他假定黑人也拥有与白种人同样的动机与抱负，并以此为出发点，发现黑人的遗产是对野蛮制度的英勇反抗。

4年之后，斯坦利·埃尔金斯出版了《奴隶制：对美国习俗及脑力劳动者生活的研究》（1959年）一书。他在该书中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设想和不同的问题。他指出，黑人不可能与白人一样，因为被奴役的经历必然使他们发生变化。当时的观察者们——种植园主和北部的旅游者——已经对典型的奴隶特性作出了描述：“黑鬼”的特点是撒谎、偷窃、怠工、装傻、在主人面前像个小孩。在埃尔金斯看来，这种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的对黑人形象的描述背后定有几分真实性，因此，他开始研究这些特性是如何形成的。

与菲利普斯和斯坦普截然相反的是，埃尔金斯并没有对种植园的档案作新的研究。他利用了现有的对美国 and 拉丁美洲奴隶制的比较研究，总的来说，这些比较研究中的结论往往把美国的奴隶制看作是西半球中最残酷的、压迫最深重的制度。他把这一情况与纳粹集中营内犹太人的处境进行对比研究。他指出，集中营与奴隶种植园极为相似，而集中营对犹太人心理造成的伤害，有助于搞清奴隶制对奴隶的影响。集中营创造出了像婴儿般易于管教的犹太人，种植园则产生像婴儿般易于管教的黑人。如同党卫军警卫与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种植园主与奴隶也处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党卫军警卫或种植园主可以大施淫威。奴隶们的非洲文化、家庭生活或是其它任何可以制约种植园主权力的制度统统失去了，甚至连一面能稍稍校正他们被歪曲的形象的镜子也没有。在奴隶的世界里唯一的重要人物就是他的主人。埃尔金斯根据纯粹由他自己调查来的范例，他认为除了个别例外，绝大多数奴隶都不能逃脱掉这一野蛮制度给奴隶们带来的心理上的扭

曲。奴隶们遗赠给子孙后代的不是反抗，而是破碎的家庭、被伤害的心灵和扭曲的文化。

埃尔金斯的著作引起的争论，导致了近年来许多关于奴隶制的著作的出版，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美国奴隶制的详细而透彻的研究，已把他文章中的重要部分推翻了。北美洲与拉丁美洲的反差并不像埃尔金斯所说的那么大，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却又比埃尔金斯所描绘的复杂得多。尽管如此，他把奴隶的思想作为研究问题提出来是有贡献的。为了迎接这一挑战，史学家们找出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调查方法。不仅要用计量方法研究种植园经济，而且还要把该方法用于逃奴和家庭生活研究。已经发掘出来的材料，使得他们的研究更贴近奴隶的思想、感觉和价值观。这些都是从他们的歌曲、故事、自传和口述史中发掘出来的。

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一个共识，即不管奴隶制度多么苛刻，奴隶们还是能在主人控制的范围之外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他们创建各种制度，形成适合自身需要的文化气质，以便在严酷的奴隶制度下生存下来，并且把反抗的遗产传给子孙后代。对两种关键性的制度——家庭制度与教会制度——的重新考察，为这种共识提供了许多证据。在《奴隶社会》（1972年）一书中，约翰·布拉辛格姆根据自由民局的统计记录，指出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奴隶都生活在有父有母的双亲家庭里。赫伯特·古特曼在《奴役与自由中的黑人家庭》（1975年）一书中，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观点。他证明说，不仅绝大多数奴隶生活在父母健在的家庭中，而且他们的双亲还能白首偕老，尽管法律不予承认。不管制度如何，婚姻与家庭显然是奴隶生活中有实在价值的东西。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古特曼看到了足以说明种植园居民区中的复杂关系和亲属之间网络关系的证据。与埃尔金斯的假设相反，奴隶们所认可的只是他们彼此间的关系，而不是同主人的关系。他们为子女取的名字、他们对自己家庭所表现的爱恋之情，他们在亲属间与非亲属之间所铸造起的牢固关系，与那种把白人种植园主看成是奴隶世界唯一的“最重要的外人”的论点是不能调和的。

对奴隶宗教生活的研究，更加强了这一看法。艾伯特·雷伯特优和尤金·吉诺维斯描述了一个丰富而复杂的信仰制度。通过这一制度，奴隶获得了世人的尊严和生活的目的。他们信仰的不是证明黑人要接受白人统治的种植园主的基督教，而是证明黑人也是上帝之子的奴隶的基督教。一些历史学家还进一步论证说，奴隶的宗教为他们集体反抗和暴动提供了基础。另一些人，特别是吉诺维斯，却持相反观点，认为是宗教把奴隶们反抗引上了基本上属于非政治的与非暴力的道路。宗教再次重申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并对种植园主的种族主义说教麻木不仁，但是它并没有提出千年王国的思想，更没有启发他们有权革命的政治觉悟。宗教使奴隶变成了人，但没有使他们成为斗士。

除了在奴隶们成功地创造了一个自己能选择价值观和律法的半自治社区方面有一致的看法外，史学家们在关于奴隶制的性质与作用的解释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历史学家们通过不同路线达成了一致看法。布拉辛格姆指出，奴隶主之所以鼓励奴隶组织家庭，是因为看到这么做能带来经济利益，而奴隶们却抓住这个机会，铸造家庭和社区网络。与其它社区一样，在奴隶社区中生活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除了“黑鬼”之外，还包括好造反的“老土”和爱管闲事的“杂工”。他们平时随遇而安，遇有机会就起来造反。在《苦难的时代》（1972年）一书中，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英格尔曼走得更远。他们争论说，靠奴隶劳动能生产出大量产品，说明那个制度是有效率的。因此，种植园主肯定是公道的管理者，依靠鼓励和善意对待奴隶的办法从他们的支付中获得最好的收益。反过来，奴隶们认真而努力地劳动，为的是保护自己的家庭，过上平均水准以上的生活，并取得各种报酬与鼓励。这种形象与 U·B·菲利普斯描绘的形象有许多相同之处，只不过后者用黑人霍雷肖·阿尔杰斯的名字代替了前者使用的“黑鬼”一词罢了。

尤金·吉诺维斯的《奔腾吧！约旦河》一书，是迄今为止论述这方面问题最清楚、最具综合性的一部著作。与西半球其它许多地方的奴隶主（巴西殖民地除外）不同，美国的种植园主都住在自己的种植

园里，并同奴隶发展个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家长式的。同时，种植园主与奴隶双方都有一种相互认可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这种家长式统治决无父亲对子女的仁慈与善意。吉诺维斯在研究种植园时发现了大量残酷与悲惨的事例。然而，残酷并不是准则。准则是在种植园主与奴隶间暗含的讨价还价中规定下来的。种植园主负责奴隶生活福利方面的事（食品、住房、医疗护理），反过来，奴隶向种植园主提供劳动力。这种交易证明了种植园主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以及奴隶制度本身的特点；这些情况与 U·B·菲利普斯的观点极为相似。奴隶却用他们自己的见解来说明这种交易。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存与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联系并不明显。种植园主付给奴隶劳动的报酬或是提供宗教礼拜的服务，却经常被奴隶视为应有的权利。

吉诺维斯著作的优点是，他力图把种植园主与奴隶双方置于同一制度下进行研究。确实，正是种植园主与奴隶的斗争界定了这一制度的定义。当然，这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在吉诺维斯看来，种植园主的势力不仅主宰着奴隶的世界，而且决定了世人对奴隶世界的看法。因此，人们所看到的奴隶社会，只不过是种植园主镜子中反射出来的社会而已。奴隶不单要适应家长制的那套信念、作法与价值观，而且还要与之融为一体。尽管吉诺维斯的辩证论断给人以深刻印象，然而，他的论证却始终停留在逻辑推理上，缺乏普遍知晓的事实。他用来说明问题的信件和日记，对我们了解种植园主的思想是很有帮助的，却无助于了解奴隶的思想。至于说明奴隶思想的材料，他使用的是 20 世纪 30 年代由公共事业振兴署收集的以往奴隶的回忆录。然而，这些资料在表达奴隶的思想与体验时，不如种植园主日记对奴隶主思想表述的那么直接。而回忆录中所展示的世界，不是奴隶们生活过的那个世界，而是他们记忆中的世界。

劳伦斯·莱文在《黑人文化，黑人意识》（1977 年）一书中，避开了这方面的问题。他从奴隶们的故事、歌唱、谜语以及玩笑中发现了较多直接说明奴隶体验的资料。这些原始资料表明“奴隶们的自豪